

文德泉蒙席——一位澳門歷史學家的足跡*

何思靈**

歷史事件各有不同，有一些事件比較深刻而另外有一些事件則容易被人遺忘。

1912年2月，晚清的末代皇帝溥儀，在一場共和革命面前，被迫遜位。當時他年僅6歲。同年4月，在14日至15日晚間，Titanic號沉沒在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世界為之震驚。可是就在當年4月15日的同一天，文德泉蒙席出生於布拉干薩區弗雷舒·德·愛斯帕達啊·辛塔。他後來成為里斯本地理學會的會員。¹

今天，我們在此紀念他。

第一件事已無人問津。第二件事情，有電影、電視劇、報導與報紙上的文章避免它被遺忘。第三件事，由於他那浩瀚的史學著作，其英名不朽。的確，文德泉蒙席是葡國人中最偉大的東方歷史研究人員之一。他與潘日明及博克塞可稱為“澳門史學三大家”。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自身的產物。”奧爾特加·加塞特如是言。文德泉便是他那個時代的人物。1912年的葡萄牙可以為一個後山省的孩子提供什麼樣的教育呢？除了入神學院，受教育的機會很少或根本就沒有。但是，早期的葡萄牙共和國敵視宗教教育，1924年，少年時代的文德泉便決定遠赴東方，到澳門聖若瑟神學院求學。

* 在里斯本地理學會亞洲委員會2012年9月14日舉行的慶祝澳門歷史學家文德泉蒙席誕生百週年會議上的發言。

** 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歷史學學士，有多項澳門研究，塔基得出版社出版人。

1. 文德泉蒙席（1912-2003）於1955年3月7日被接納為里斯本地理學會（SGL）通訊會員，會員號16203。職業為葡萄牙保教權在新加坡和馬六甲傳教士，具哲學及神學課程學歷。

在澳門，他在教會內部接受教育，這種生活塑造了他的生活觀，產生了天主教作為意識教化力量的作用。

他遺留下來的著作極其廣泛。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及其教區》之十三。它敘述中國傳教史，所以題為《中國差會》。

該書的起始處為1578年來到澳門的意大利耶穌會會士范禮安的誇張及戲劇性的感嘆，他當時負責中國和日本的天主教差會。根據曾德昭在《大中國志》³中的記載，他一邊從聖保羅總院的窗口眼望著中國大陸，口裡一邊發出了感嘆：“岩石，岩石，你的宗教之門何時打開？”

的確，16世紀不是一個“基督宗教”在中國得以立足的年代。

范禮安很快就意識到，要進入中華帝國傳播福音就必須學習漢語。他於1598年1月的一封信中，寫道：“當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的這個港口，前往日本時，希望以某種方式試圖為神聖的傳教打開這扇緊閉的大門，派一些神父到內地去生活，我明白到不先學漢語的口語與文字好像是不可能的，我命令在澳門選擇兩位神父，專事學習，盡量免去他們的一般工作，為他們的學習提供老師和一切條件。”⁴

一、漢學研究

西方神父尋求通過學習漢語來解開天朝生活的秘密導致了最終揭開了文化研究的新篇章：漢學。

2. 其主要著作有：《澳門教區及其教區》16卷、《澳門軍人》、《澳門廟宇》、《澳門16世紀》、《澳門17世紀》、《澳門18世紀》、《澳門19世紀》、《澳門的日本人》、《澳門醫學》2卷、《澳門地名》、《澳門總督官邸》、《議事亭》、《遠東葡萄牙語定期刊物》、《19世紀澳門名人錄》、《澳門傑出女性錄》、《石頭之聲》、《賈梅士洞》、《澳門之緣起》、《崗頂戲院》、《澳門名人錄》、《澳門警察》、《澳門王室大法官》、《澳門滄桑》、《16-18世紀澳門女性服飾》。

3. 曾德昭著、高美士譯、安文哲序：《大中國志》，澳門教育暨青年司和澳門基金會，1994年。

4. 《中國差會》，第9頁。

另一位意大利耶穌會會士羅明堅在天主教進入中國過程中，亦飽經滄桑。通過閱讀《澳門及其教區》這本書的頭幾頁，我們追蹤這位神父企圖打開中國這塊“岩石”的持久與艱難的努力。1579年7月，羅明堅已在澳門，開始執行范禮安的命令，“滿懷熱情地學習北京話”。

文德泉蒙席告訴我們：“這項工作不容易，因為內地來的華人不太熟悉北京話，生活在廣東省的雙語翻譯人員對於北京話一無所知，更難以轉化成葡萄牙語。當時在澳門，只有一個葡萄牙語程度很低的畫家給他畫出圖來表達字詞的意思。例如，在一匹馬的情況下，畫家先畫出馬，然後在底下註上馬字，所以葡萄牙人和神父們都認為學習中文是件可笑的事情。”⁵

羅明堅神父在一致總長的信中，承認學習漢語有困難，其結構與西方語言大不相同：

“視察員神父為我留下了書面命令，要我學讀、寫、講漢語。為此，我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但漢字與我們和其他國家的文字大不相同，因為這種語言無字母表，亦無定數的字母。有多少詞或短語，就有多少字，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也要學15年的時間才讀得懂他們的書。

“開始學習之處，我的確氣餒過，但在順服神旨的力量支持下，我盡可能地堅忍不拔地完成這個命令。”⁶

他請一個夥伴幫助他擔起這個學習的擔子。

羅明堅尋求每年兩次去廣交會的葡萄牙商人的幫助。最終於1580年把他帶到了省府廣州。他在那裡逗留了三個月。1581年，重返廣州兩次，1582年，回羊城一次。

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是不穩定的，受到廣東當局的壓力。恐嚇外交手法也用上了。兩廣總督要求主教梅爾基奧爾·卡內羅和甲比單末唐·若昂·德·阿爾梅達去肇慶見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5. 肇慶（Shiu-Hing 或 Chaoquim），兩廣首府，人口200,000人，有七星岩、七星山。見同書。

6. 《中國差會》，第27頁。

——在沒有皇帝的札諭情況下，憑什麼在澳門有這麼的葡萄牙人、日本人和黑人居住；

——憑什麼“在中國皇帝的土地上”，主教與軍人未行使管轄權。⁷

作為軍人和主教代表，指定的王室大法官和在巴範濟神父陪同下的羅明堅神父，帶著一份價值2000澳門元、“在中國備受推崇的”天鵝絨和歐洲鏡子的厚禮，去到肇慶。

他們在鑒金大殿受到了接見，晚清官員坐在太師椅上，“非常莊嚴，兩則排列著300名身著華麗服裝、全副武裝的軍官與士兵”，他們馬上獻上了禮物。

眼望著絲綢和水晶，晚清官員滿心歡喜，其他都不必說了，這位大官立即保證葡萄牙人可以呆在澳門。“從當時開始，按照葡人的方式”管理葡人，但是前提是要服從晚清官員的命令。

有一次羅明堅在澳門病倒了，但他為了向兩廣總督推介一台鋼製的機器，裡面都是自動不停轉動的輪子，外面可以呈現白天和晚上的所有時間，而且有一個小鈴，發聲報點，這可是在中國見所未見的藝術與機巧之物。⁸

對機器的描述令兩廣總督興趣盎然，召羅明堅去肇慶。再次在巴範濟神父的陪同下，於1582年12月前往。

“鐘錶呈上，這新奇的東西令人驚異”。

作為感謝，3位耶穌會會士得到了日思夜盼的允許在中國居住的許可令。1583年，他們在當地舉行了第一次彌撒。

二、要克服的困難

但是，台階並未全部越過，還有困難急需解決。這個兩廣總督因將“幾個文人鞭打至死”而被皇帝罷官。他害怕其繼任者不會再

7. 《中國差會》，第27頁。

8. 《中國差會》，第27頁。

對神父們在中國居住有這麼大的興趣，給了神父們一份蓋了他官印的札諭⁹，命令廣東海道在首府給他們一塊地方，起造一座教堂，並在那裡居住。

在神父們不斷努力之下，他們在澳門的居留“漸入佳境”，據利瑪竇稱，羅明堅和巴範濟離開肇慶時，曾許諾送給總督一份好禮，以得到允許神父們進入的許可，實際情況卻是，這位官員收到了一個士兵的稟呈，請求批准在肇慶建造一所房子和一所教堂，理由是神父們已在此居留6個月，受到前任總督的款待。他曾許諾讓他們留在中國，因為“這對國家大有裨益，國家也很滿意。指出了他們的好處，以及數學、地球儀、地圖、鐘錶及類似的奇巧之物。”¹⁰

總督將請求轉批肇慶府尹。府尹簽發了文件，讓那士兵送到澳門。

這曾讓意大利耶穌會會士范禮安傷透了腦筋的“岩石”大門終於打開了……。

三、結論

總而言之，漢學研究起源於中國的傳教。

進入中國的初次嘗試很艱難，羅明堅不得不忍受各種艱難，除了學習漢語的困難外，某些他的同伴對他不無鄙視，懷疑他的學習能力。

為進入中華帝國，澳門的政治與宗教負責人做了堅忍不拔的外交工作，他們利用西方先進的科技幫助克服了本土的偏見與優越感的障礙。

9. 札諭是官方文件。“是長期以來為研究者所熟悉的‘中文檔案’。這些文獻所反映的一個事實，就是允許澳門這一葡萄牙人居留地在中華帝國秩序內存在三個世紀的‘共識’。此種‘共識’的具體表現，便是一系列說明及保持了四百年‘承諾’的協議和條約。這一切是澳門作為中國內部自治社群而存在的根基所在。”引自金國平、吳志良、薩安東：“‘中文檔案’澳門歷史及中葡兩國的悠久關係”，《行政》，第17卷，第4期（總第66期），2004年12月，第1275頁。

10.《利氏史料》，第175頁。引自文德泉。

文德泉蒙席的史學著作涉及了這一切，其中包涵各種豐富而細緻的信息源泉，與中國當局接觸的最初幾年的經驗歷歷在目。

然而，至於其史學遺作的重要性，有些路還需要開荊披棘，例如他的著作風格簡約、涵蓋的主題繁多、描寫入微，可以成為電影或電視紀錄片的劇本。

他的著作是他生活過的時代和所接受的教育的產物。如今，歷史學科的研究有了新的方式，在學習知識的道路上，人類的進步無止境，布魯諾在16世紀如是倡導。文德泉蒙席所從事的關於葡萄牙人在東方的歷史研究與見證對年輕一代歷史研究學者來說，是對從事葡中四個多世紀合作歷程的一個最重要的經驗。

其一生漫長，其作品長久。